

语言安全问题研究综览

Language Security Problems: A Historical Survey

贾洪伟*

yywhyj@163.com

Jia Hongwei

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部
北京 中国, 100048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ollege English
Beijing, China 100048

本文以中外语言政策史为据, 回顾英、美、德、法、苏等国出于国家安全角度制定出的语言政策, 分析国内现有语言安全成果, 反思中国国内有关语言安全研究的现状, 指出当前研究的五点不足: (1) 偏重宏观层面的空论, (2) 止于文献梳理, (3) 缺少基于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调查的专论, (4) 鲜有关注网络媒体的语言安全问题, (5) 未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全问题和区域语言安全战略的研究。

[关键词] 语言安全; 国家安全; 安全问题; 国内外现状; 启示

This paper, grounded on historical facts of language policies worldwide, reviews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policies in Great Britain, United States, Germany, France and Soviet Union in terms of national security, analyses the achievements of language security at home, reconsider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anguage security in China, and points out the weaknesses of language security problems in China: (1) stressing on macro-level researches, (2) standing still over literature review, (3) lack of the researches based on ethnic areas and cross-border regions, (4) short of the studies of language security problems over internet media, and (5) language security problems in ethnic areas and regional language security strategy to be done.

Key words: language security; national security; security problems; status-quo; implications.

* [作者简介] 贾洪伟, 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学博士,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 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国外语言学汉译史、翻译思想史、社会语言学。

1. 引言

纵观历史，中国历代均有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出台相关的语言文字政策，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秦统一六国后，采取的“书同文”政策，元朝创制国书推行国字（八思巴字），清朝的胡服骑射等语言文化安全政策。新中国建立后，政府针对外交和国防需要建立外交和外语院校，培养通晓外语的专门人才，但开设的语种和语言掌握的程度尚显不足；针对少数民族的语言使用状况，开展大规模的田野调查，为无文字的少数民族制定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文字，制定国家语言文字政策和法规，规范语言文字的使用。然而，对语言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层面重视不够，忽略了语言在国家安全¹中的重要作用，忽视了族群语言安全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没有充分重视个体语言安全与族群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关联，尚未制定宏观的语言安全政策与法规。较之美国，中国政府与学界关注语言安全相对较晚。就现状而言，在宏观认识层面和微观操作层面，政府对语言安全问题重视不足。

纵观各国历史，英德法苏等国早已关注并重视语言安全问题。早在殖民时期，英国已开始语言渗透，在非洲、印度、香港、新加坡等地区开办学校，开设英语为主体课程，旨在大批量同化殖民地居民，以便保持“永久”宗主国的地位。二战期间，英国政府出于战事沟通便利考虑，请语言学家弗斯（John Rupert Firth）给战士教授战争需要的语言。与此同时，要求参战的语言学家积极地从事英国语言文化的宣传和推广，20 世纪初期的印度就是英国推广以英语为文化和意识形态载体的显性例证。

自 1539 年，弗朗索瓦一世颁布法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较大影响的语言政策《维雷·戈特莱敕令》（*Ordonnance de Villers-Cotterêts*），规定法语为法国行政及法律语言。至 1794 年法国颁布新法律规定任何文件均须用法语签署。自 1870 年，巴斯克语及布列塔尼语专家呼吁立法保护地区语言。进而，国会议员特雷曼丹于 1936 年提议保护布列塔尼语。自 1941 年，官方允许学校在课余时间开设巴斯克语、布列塔尼语、佛来芒语及奥克语课程。直至 1951 年，政府才通过法案（*Loi Deixonne*）允许小学传授地区语言，教师可合法讲授地方语言及文学。出于法语国际地位的保护，21 个国家于 1970 年成立了“法语国际组织”，旨在保持法语的国际地位、推广法语教育等。为了捍卫法语在法国的主导地位，国会于 1975 年通过《巴斯——劳里奥尔法案》（*Loi*

¹ 国家安全研究相对较早，也相对较为系统和全面，涵盖国民安全、领土安全、经济安全、主权安全、文化安全、政治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媒体安全、教育安全等方面的内容。此外，大多有关国家安全的著述，都或多或少涉及语言与国家安全的议题，只是点到即止，尚不够全面而深入。

Bas-Lauriol), 规定商品名称、产品说明书、契约、合同等均须使用法语。(车晓菲, 2012: 50-52; 吴锡德, 2001) 近两百年中出台的语言政策, 几乎均与法语的安全问题相关, 即保护法语的主权地位和国际影响。

自 1938 年, 前苏联实施以俄语取代少数民族语言的政策, 强化各民族学校的俄语教学, 减少以民族语言出版的书籍, 排斥各种文化领域内的少数民族语言。1960 年代后, 减少和限制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范围, 加强学校教育中俄语的分量, 致使苏联宪法中规定的少数民族具有自主使用语言的权利得不到基本的保障, 甚至在苏共二十五大上明确提出“掌握族际语言——俄语是非俄罗斯民族语言发展的总方针”的政治主张, 其结果使得苏联语言政策僵化, 民族语言使用和发展出现极大的不平等, 并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与上述各国相比, 德国关注语言安全问题略晚。德国是欧盟重要的成员国, 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德国是欧共体的发起国, 还因为德国是欧盟的经济火车头, 更因为德国向欧盟缴付经费最多, 但几十年来德语并不受欧盟成员国的重视。虽然欧共体于 1958 年颁布章程, 规定欧盟所有语言都是平等的, 但作为继英语、法语之后的欧盟第三大工作语言, 德语却并不享有平等的语言权利, 如欧盟文件没有德语版, 会议没有德语同声传译等。1989 年德国意识到这一国家主权问题, 不断向欧盟抗议和抱怨, 不断要求欧盟将德语确立为与英语和法语平等地位的工作语言, 同时, 德国政府加紧推广德语, 宣传欧盟的多语政策, 最终于 1993 年德语才得以成为欧委会内部使用公文语言。这是德国为确立德语为欧盟的平等工作语言付出的努力, 同时也是捍卫德语国际主权的努力, 更是捍卫国家安全的努力。(参见伍慧萍, 2003)

此外, 密码电报和电子计算机应用于军事领域, 语言安全便被提到相当的高度。人类尚处于结绳记事时代, 就已经开始了密码的雏形。原始人的符号虽然具有表义功能, 但却与密码具有一定的距离。古巴比伦信使背着泥板传信时, 面对帝国的威胁, 只能将文字加密, 待解密后才能获取信息。中国古代的烽火与硝烟、狼烟与礼花, 无不将密码作为通讯手段。中国传统的元宵节灯谜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法国早在十七、八世纪就开始设立大型通讯塔, 靠手势、旗语等来传递消息。到了十九世纪末, 有线电报开始运营, 莫尔斯密码也开始成为普遍使用的密码。随着马可尼无线电通讯研究的开展, 各种无线电密码开始广泛使用。当时中国正遭受列强欺凌, 清王朝将电报交与外国机构和人员经营, 很多国家机密和国家政策毫无保密可言。中法战争期间, 清政府制定了两套给法国的照会, 一是战败赔款, 二是战胜轰法国出越南。法国虽然战败却控制电报, 给清政府传递战败假情报, 结果法国不胜而胜。这不仅是国家和民族的耻辱, 更是密码电报的使用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启示。

据史料记载, 美国第一台真正使用的电脑 ENIAC (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s and Calculation), 即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 是应美国军方需要计算机计算复杂的弹道方程而研制的。可见, 计算机是应军事需求和国家安全

而出现的。当计算机应用于军事领域，军事信息编制得以革新，传统的信息编制系统被废弃，传统的语言安全被迫革新。

基于回顾西方主要国家语言安全进程，以及语言相关技术发展对语言安全产生的变革，下文以美国为例梳理国外的语言安全研究现状，指出中国语言安全工作可资借鉴的经验及其存在的不足；以中国有关语言安全、国家安全和语言规划与教育的文献，梳理中国语言安全问题的研究现状，分析中国语言安全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旨在为本研究提供问题线索和内容基础。

2. 国外语言安全问题评析

据现有文献，自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已意识到语言安全的重要性，加强俄语等关键外语人才的培养，进而出台一系列与语言安全相关的政策和法规。

1958年，美国出台《国防安全教育法》，规划了外语人才培养问题，成为美国多项外语人才培养的法律基础。次年，《美国国家安全局法》规定，国家应为安全人员提供与语言相关的专门培训，资助语言相关项目培训。1993年，《国家安全教育法》提出，要为美国情报和外交部门培养熟练的外语人才。海湾战争中，因缺乏通晓阿拉伯情报人员，阻碍情报传达。此时，美国政府意识到关键外语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开始把外语看作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从而加大外语人才培养的力度。

1993年的纽约世贸中心被炸事件和九·一一事件，使美国意识到培养外语人才的必要性并出台“国家旗舰语言启动计划”（National Flagship Language Initiative）、“国家安全教育项目”（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Program），通过《国家安全语言法案》（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Act），设立“国家外语协调委员会”（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oordination Council），最终促成“国家安全语言启动计划”（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

“国家安全语言启动计划”²的本质是“一个范围广泛的计划，涉及我国的国防、外交、情报和教育”，（鲁子问，2007：125）其战略目标有三：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美国在全球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向世界传播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其方针是“保卫国家这个战略目标的组成部分”，（同上）其目的是：（1）增加美国掌握关键语言人才的数量，（2）培养美国高水平的关键外语人才，（3）培养更多的外语教师。（同上）

² 该计划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由美国教育部负责，实施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关键外语教育；第二部分由美国国务院负责，实施高中生以上学生和教师到关键语言国家去学习；第三部分由美国国防部负责，实施“国家安全教育计划”的高级专业人才培养；第四部分由美国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负责，实施“STARTALK”暑期语言培训计划。

纵观美国语言安全政策的发展与现状,至少可看出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自1958年以来,美国的语言安全政策一直以鲜明的国家安全为目标;二是美国语言安全项目一直将汉语列为关键语言,说明美国一直将中国列为国家安全的重要防范目标。

基于此,我国政府应当吸取美国的经验,采取相应的对策。譬如,(1)中国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和法规,协调汉语与外语之间的关系,³侧重于重点人群和语种的教育和培养的力度,而不应采取全民性外语教育和证书层级制度,以免浪费关键性人才培养的资源和关键期;(2)政府应尽快出台政策,规划高校外语语种培养的数量和外语人才培养数量,规范外语教育方式和教材内容,均衡英语等主流外语与小语种之间的发展及其资源分配;(3)政府应加大语言安全问题研究的投入力度,从语言角度加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网络媒体、宗教、教育、信息产品等领域的监管力度。

此外,近年出现针对个体层面语言安全问题的研究。国外相关机构和学者从面对面交际、网络及电话交谈等层面做过相关研究,如Lockton国际咨询公司的咨询师罗莉·赛沃森(Lori Severson)针对语言安全与健康问题,写作《语言安全:病人与雇员健康的根本》(Language of Safety: Driving Safety for patients and Employees, 2011),⁴探讨企业管理与员工的安全与利益问题。相形之下,针对国家战略层面的语言安全问题,国内外机构和学者多从急需语种人才培养、网络信息控制等角度入手,开展研究,制定策略,如前述美国制定的“国家安全语言计划”。

3. 国内语言安全史实与评析

早在周秦时代,语言安全问题就已提到朝廷的议事议程。当时开展的采风活动包括语言调查,旨在为朝廷统治邦国服务,其最终成果为汉·扬雄《方言》。之后的历朝历代均存在出于朝廷安全考虑而发起的活动,或基于该目的而建立的机构。据王静(1999)推断,最初的四夷馆约在北魏宣武帝景明二年(即公元501年)建立,由金陵、燕然、扶桑和崦嵫四馆构成,以供归魏的南朝人士、边夷侍子、朝贡使节、入朝的民族首领和往来洛阳的商胡贩客居住。至明朝,虽然同为“四夷馆”,但所行职责各有不同。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因四夷朝贡,言语文字不通。命礼部选国子监生蒋礼等三十八人隶翰林院,学译书”,始建专营语言文字翻译的机关和教习机构,最初只含鞞鞞、女真、回回、西番、西天、百夷、高昌、缅甸八馆,后于1511年和1579年分别增设八百和

³ 据台湾元智大学中国语文系助理教授徐富美介绍,台湾大学均把中国语文设置为必修课,分为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两类课型,每周4课时以上,而英语每周则只有2课时。

⁴ 参见 http://www.lockton.com/Resource/_PageResource/MKT/Language%20of%20Safety%20White%20Paper.pdf, 2012-6-1.

暹罗二馆，共十馆。四夷馆开设各类馆课，语言文字、风土人情、天文地理无所不包，其本质是明朝专门设置的亚洲诸民族语言文化学习和研究的机构，是中国最早的专司语言文字信息的安全机构。（刘迎胜，2011；王晓龙，2012等）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占统治地位的大一统政权。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以及蒙古文化扩张等方面因素的考虑，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创办了专门教习蒙古新字的蒙古字学，不仅为元代培养了大批熟悉运用该文字的翻译人才，而且为巩固元代政权起了积极作用，史称元朝国书运动。（张学强、艾丽，2011）此外，中国的“胡服骑射”政策也属于国家安全的战略举措。为了抵御北方胡人的侵略，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即穿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使赵国军事力量日益强大，西退胡人，北灭中山国，最终成为战国七雄之一。此后，胡服成为中国军队中最早的正规军装，而后演变为盔甲装备。胡服骑射政策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奠定了中原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融合的基础，促进了中国民族的大团结。⁵可北方少数民族之一的满族入关后，为了强化其统治，捍卫国家安全，推行游牧民族服饰，强令汉民剃发易服，这是继“胡服骑射”之后的又一次显性突变，对维护满清的统治和国家安全起到重要的作用。

1949年后，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语言调查、语言识别和民族识别，制定语言规划，创立和统一少数民族文字，规范汉字，推广普通话等。

较早涉及语言安全内容的文献当属中国社会科学院黄长著编《各国语言手册》（重庆出版社，2000）和黄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之后相继出现周庆生主编《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语文出版社，2001）、周庆生主编《国家、民族与语言》（语文出版社，2003）、“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组”编《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商务印书馆，2006）、“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组”编《香港语言状况与语言政策》（商务印书馆，2006）、“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组”编《澳门语言状况与语言政策》（商务印书馆，2006）、“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组”编《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商务印书馆，2007）等著作。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也纷纷撰文阐述国内民族语言问题，其中不少文章涉及到了“语言安全”内容，如孙宏开（2001；2006）、戴庆厦等（2001）、王远新（2002；2008）、徐世璇（2002）、罗冰眉（2002）、李梅峰（2003）、邓佑玲（2004）、高莉琴（2006）、吴铮等（2006）、陈章太（2009）等。此外，国家针对语言文字、少数民族做出的相关政策法规，也涉及中国语言文字安全的内容，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2004）、《国务院批转国家民委关于进一步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报告的通知》（199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⁵ 有关“胡服骑射”的内容，请参见百度百科“胡服骑射”词条 <http://baike.baidu.com/view/34601.htm>, 2012-7-23.

(1984、200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1)等。

尽管上述著述不同程度地涉及语言安全的内容,但这些著述并非是探讨语言安全问题的专门作品,因而这些文献只能构成“语言安全”研究的前期文献或是辅助性文献,还不能视为“语言安全”研究的专门文献。

据2012年6月1日“中国期刊网”1979-2012年的数据显示,以“语言安全”为“题名”搜索结果的论文共有16篇,其中含计算机网络与语言安全相关论文10篇;⁶以“语言安全”为“关键词”搜索结果的论文共有11篇,其中含计算机网络与语言安全相关论文4篇⁷。综合两项搜索结果,共获得中国语言安全相关论文9篇,其中有硕士学位论文一篇(艾萍,2009),其具体分布如下表:

(据中国期刊网2012年6月1日数据统计)

年代	发表数量	年代	发表数量
2006	1	2009	3
2007	1	2010	1
2008	1	2011	2

如表所示,自2006年,国内期刊出现有关语言安全的科研成果,但数量不多。自2009年,有关语言安全的期刊论文的数量略有增加。就内容而言,自2006年至2011年发表的9篇论文,均围绕语言安全主题,涉及全球化环境中语言的生存危机、语言安全问题的思考、汉语的魅力、语言安全与语言资源、民族文化安全、语言安全与和谐社会、国家安全对策和母语保护等内容。

2006年,罗文清翻译越南学者阮文康的《语言死亡:语言的安全与不安全》,从全球一体化与都市化视角,探讨语言从安全到不安全的发展过程,不同阶段语言的危机程度,进而引进语言安全等级划分的5种类型,即永久语言(viable languages)、永久小语言(viable but small languages)、濒危语言(endangered languages)、濒临绝种语言(nearly extinct languages)和绝种语言(extinct languages)。另外在其论述中进一步引介弱势语言中濒危语

⁶ 有关计算机网络与语言安全的十篇文章如下:《Java语言的安全特性》(2000)、《Java和C++语言安全机制及网络安全规范的讨论》(2002)、《Java语言的安全机制》(2002)、《基于Russel语言的安全审计数据分析》(2004)、《基于程序设计语言的安全模型》(2005)、《C语言安全编码器研究》(2005)、《基于模型检测的C语言安全信息流研究》(2007)、《一种基于可扩展标记语言的安全策略描述语言及其应用》(2007)、《基于安全WFS模式的地理识别语言安全传输技术》(2007)、《基于程序设计语言的安全解密模型研究》(2008)。

⁷ 有关计算机网络与语言安全的4篇论文如下:《Java语言的安全特性》(2000)、《基于STEP-XML的虚拟企业信息集成及信息安全的研究》(2004)、《搜索引擎网页快照的安全性研究》(2007)、《恶意代码识别的研究与实现》(2008)。

言的五个小类：潜在濒危语言（*potentially endangered languages*）、濒危语言（*endangered languages*）、严重濒危语言（*endangered languages*）、奄奄一息的语言（*moribund languages*）和绝种语言（*extinct languages*），最后指出语言从安全到不安全的发展过程，导致某些弱势语言（特别是少数民族语言）的最终消亡。

该文有关濒危语言的相关内容源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濒危语言的界定标准。我国学者在讨论濒危语言时，广泛吸收了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其中黄行（2000）、孙宏开（2006）、王远新（2008）等都有专论或专著，不过国内学者一般立足于正面讨论，使用“语言活力”这一概念。

阮文针对语言本体安全的言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语言从安全到不安全进而死亡的发展过程，并非只取决于使用者的多寡，还存在其他众多因素，其中政治意识形态、族群对语言的认同度等都是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此外，语言的不安全也并非只对人口稀少的民族而言，对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亦是如此。譬如，希伯来语文曾一度因为无人使用沦为死语言，后因以色列建国采用其为官方语言文，一度复活。可见，语言的安全与否，主要依据该语言在国际、国家、族群层面的重要程度，而不是只依据使用者人数的多寡为判断标准。

蓝庆保的《具象与语言——由〈暗示〉引发的对语言安全问题的思考》一文（2007），以韩少功的小说《暗示》为线索，指出确保语言使用的安全性与有效性，必须使语言与具象结合。该文与其说探讨的是语言安全问题，不如说是《暗示》内容与语言关联问题的思考，原因在于：该文只阐述了小说中人如何饱受语言危险性的折磨，继而探讨了具象的威力及其与语言本体安全的关联，因而，其本质并非是探讨语言安全本体的文献。

孔庆东《语言安全与汉语的魅力》（2008）以汉语为论述核心，阐述汉语用以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完整的历史使命及其重要性，指出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在媒体和信息安全方面对汉语造成的冲击，进而申述汉语在历史、语音、语法、文字等层面的独特优势，特别是汉语在国防安全信息传达方面的迅捷性。该文从历史与现实的宏观视角和音、形、义的微观视角，探讨汉语的独特优势，旨在呼吁国人重视汉语在国家安全、民族危亡中的作用及其重要性。该文语言平实、举例丰富，但仍只局限于分析现实，只局限于微观的个体和族群层面，尚未从宏观层面提出应对西方安全冲击的对策。

陈章太《语言资源与语言问题》（2009）旨在《论语言资源》（2008）基础上，着重探讨语言资源与语言问题的关系与转化。在谈及语言问题的构成及其转化时，陈氏专门探讨“语言问题与语言安全”，界定语言安全的概念，阐述语言安全的内容及其与社会和国家安全的关联，指出语言安全问题对国家与社会安全的作用及影响。作者引用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前苏联、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的事例，举证语言安全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该文重在探讨语言资源与语言问题的转化，只是在宏观层面略微述及语言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尚未

涉及个体与族群层面的语言安全问题，也没有系统探讨中国语言安全的现状，并提出相应对策。

艾萍《语言安全与民族文化安全》(2009a)⁸，阐述语言安全是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内容、语言安全危机潜藏着民族文化安全危机，即使在“汉语热”的今天，中国仍不免受到语言安全的冲击和威胁；指出以英语为载体的美国文化，影响了中国人的语言态度和语言选择、甚至是价值观念和民族认同，削弱了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已威胁到中国的语言文化安全。因此，保护和捍卫母语已迫在眉睫。针对上述问题，作者提出四点对策：(1) 加强青少年的母语忧患意识；(2) 开展传统文化活动，强化国民的文化认同；(3) 制定汉语国际推广战略；(4) 落实语言战略行动计划，提出应对重大语言问题的科学预案。该文所说“民族文化安全”，是中华民族的大概念，并由此探讨国家的文化安全战略，没有涉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在个体与族群层面的语言安全问题。同年，艾萍完成硕士学位论文《论语言安全与民族文化安全》，作者回顾国内外有关濒危语言的文献，旨在以语言更迭的历史为鉴，阐述民族语言遭遇的安全危机、民族文化安全危机、语言文化生态受到的威胁。作者认为，英语在教育、网路媒体信息等层面对汉语产生相当大的冲击，甚至导致汉语作为母语的传承危机，进而描述母语危机的现象和特征，揭示母语危机的战略意义。在此基础上，参考国外语言保护政策、语言推广政策，提出应对语言安全与民族文化危机问题的五项对策⁹。该文虽然冠以“民族文化安全”，却涉及很多外国语言文化的史实，所占篇幅的也较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民族文化安全内容。另外，作者更多的讨论国家甚至全球宏观层面的问题，忽略了挖掘和探讨个体与族群等微观层面的语言安全问题及其与国家安全关联的探讨。

针对我国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存在的问题，前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李宇明司长以记者访谈录形式做出解答。关于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方言与普通话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为了社会的发展、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必须推广普通话。但是不能把推广普通话和保护方言对立起来，孩子的学习能力是很强的，掌握双言并非难事。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也应当尊重方言，尊重方言就是尊重这一方的人民，保护方言，就是守护国家的语言资源。同时要看到，方言也是普通话的源泉。”

关于民族语言问题，李氏认为，汉语方言同民族语言实际上完全是不同层面的现象。“汉语方言是汉语的地域变体，而民族再小，它的语言跟汉语都是

⁸ 该文主体内容系作者硕士学位论文《论语言安全与民族文化安全》(2009)的第三章“语言安全与民族文化安全”(2009: 22-34)与该文第五章“对策”的第二节“我国应采取的对策”(2009: 38-44)加以修订而成。

⁹ 这五项对策为：(1) 增强公众对母语的忧患意识和捍卫意识；(2) 走出“英语崇拜”误区，提升母语自信心；(3) 制定国家文化战略；(4) 实施“走出去”战略，完善汉语推广；(5) 尊重文化多样性，提倡“和为贵”。(参见艾萍，2009b: 38-44)

平等的，是‘语’而不是‘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要给民族语言足够的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情况非常复杂，发展情况不一样，发展阶段不一样，有些民族没有文字，只有口语，有些民族有大量的悠久文化文献，有大量的人在使用。要根据各民族语言的具体情况和民族的意愿，合理处理民族语言问题。在民族语言保护方面，特别重要的几点是：（1）应该赶紧调查记录民族语言，建立民族语言的语料库。这就等于建立中华语言和文化的基因库。（2）要大力提倡双语教育，少数民族学生在学好母语的同时，要学好普通话。不学好母语就失去了民族之根；不学好普通话，将来就难以走遍全国，难以参与国家管理。（3）应该尊重各民族的语言权力和语言选择，要和民族同胞共同研究民族语言问题，提供全方位帮助，切忌把良好的意愿强施于人。”“我国的民族语言政策是很好的，有法律保障。不仅国家的《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有明文规定，而且民族自治地方也有本地区语言文字的法规条例，比如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都有。内蒙古自治区确定以正蓝旗话为蒙古语的标准语，像我们推广普通话一样，他们也在蒙古语地区推广标准语。现在最令人忧心的是几个濒危的少数民族语言，比如满语、赫哲语、鄂伦春语、土家语、畲语等。”

关于外语教育以及如何处理外语和汉语教育的关系问题，他认为，“（1）要把外语看成一种重要的资源，看作是人的一种素养，国家提供外语教育，是在保证人们的语言学习权利。对母语与外语的冲突，心态放平和些。（2）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外语直接影响到个人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学习外语既是个人需要，也是国家需要。（3）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一种世界观，学习外语意味着掌握了另外一种文化，掌握了另外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表达世界的方式。所以对个人来说，多点外语训练是有好处的。但是人的“语言学能”是有差异的，有些人学习语言的能力强，有些人学习语言的能力差。因此，不能搞全民学外语，更不能把外语当作衡量一个人能力的硬尺度，并因此剥夺人的学习机会和工作机会，这既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精神，也不符合语言学习的规律。最后我要强调的是，不能把外语凌驾于母语之上，不管在政策层面，还是心理层面。”“外语语种单一化，是当前中国外语教育中的大问题。只学英语的话，我们会失去半个世界，甚至大半个世界，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有人把世界上很大的语种叫‘小语种’，比如法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这名称就反映出了外语教育中的语种问题。中国人学习外语的目的，主要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是‘吸收型’的。事实上我们现在还要预计外语在中国的其他作用。”“外语教育不能完全靠市场，社会需求多的语种可以靠市场调节，一些所谓的‘小语种’，国家需要储备的语种，要靠国家政策调控。可喜的是近几年来，所谓‘小语种’的地位有所提升，市场需求也在上升。很多院校新办了许多‘小语种’专业。但是仍然不够合理，而且缺乏规划。我国需要科学的‘语种教育规划’。”（李宇明，2007）

骆峰《关注语言生活，共建和谐社会——首届中国语言生活学术研讨会会

议综述》(2010),介绍“首届中国语言生活学术研讨会”围绕“中国语言生活状况研究”和“《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开发、利用和改善”两大主题开展研讨的情况,总结了与会者针对《中国语言生活状况研究》及当前中国语言生活状况的思想和观点,认为“母语水平滑坡”、“母语与外语的关系”和“国家语言安全”是当前亟待解决的三大问题。此外,尚有国家语言发展战略规划、语言资源的调查和保护、信息时代新的语言工具引发的语言问题、汉语信息化、文化素质教育等语言生活问题。该次会议的成功之处在于,确定了今后中国语言生活研究的大方向,以及有待关注和解决的语言生活问题。不过,会议对个体、族群和国家层面语言安全问题鲜有涉及,也没有从宏观层面明确今后语言安全工作的的发展方向及其明确战略地位。

王建勤《语言问题安全化与国家安全对策研究》(2011)梳理了美国“关键语言”战略与语言问题安全化的策略,指出该战略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外部威胁(即军事利益、经济利益及意识形态)与内部威胁(即外语语种能力不足、外语人才分布不合理及“复合型”外语人才匮乏),提出中国应对现时状况的安全策略:(1)加强外语语种规划,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包括军队外语语种能力规划、高校外语教学和国民外语素质;(2)建立国家关键语言政策,全面提升国家外语能力,用于海外能源开发、防恐及陆边战略需要;(3)制定国家对外语言战略,应对美国语言安全战略在军事和政治领域的渗透。该文以美国语言安全战略为参考,从宏观角度分析国家安全问题,提出中国的语言安全策略,但没有涉及中国内部的语言安全,特别是边疆及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安全问题。

达·巴特尔《母语与语言安全问题——纪念第十二个国际母语日》界定了“母语”和“语言安全问题”,指出母语是语言问题的核心,也是国家安全问题的重中之重,提出如下观念,即“提高公民意识,维护语言权利,不侵犯他人语言权利;保护母语,保护民族语言的工作;保障公民语言权利,建设和谐语言生活”。(达·巴特尔,2011:161)作者梳理了内蒙古自治区语言资源的现状,引证历史上出现的母语环境恶化、语言危机多样化、语言冲突地区化等教训,建议加强语言文字政策的立法工作。该文从国家层面阐述语言安全问题的重要性,进而切入族群层面的语言安全问题,再缩小至族群的语言濒危问题,是语言安全研究逐渐深化的表现。不过,作者没有涉及个体语言安全问题,也没有涉及社会母语在网络信息、大众媒体、出版物、教育等领域的安全问题。

有关国家安全、语言规划、外语教育的著述,也涉及到语言安全议题,且数量远远超过专门论述语言安全问题的文献。据2012年6月4日“中国期刊网”1979-2012年的数据显示,以“国家安全”为“题名”搜索结果的论文共有3392篇;以“国家安全”为“关键词”搜索结果的论文共有17181篇。这说明,语言安全的专门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远远落后于国家安全的研究。在有关国家安全和语言规划的研究中,有大量参考美国“关键语言计划”的成果,有的文章侧重于介绍美国的语言安全战略(鲁子问,2007),有的以参考美国

语言安全战略反思中国的语言安全现状（戴曼纯，2011），也有以国外语言状况反思中国外语教育战略（鲁子问，2011；陈兵，2012），还有针对制定和策划中国外语教育规划的讨论（如康建刚，2010），等等。

4. 当前国内研究的不足

综上所述，前人研究存在以下不足：（1）多从国家宏观或族群角度考察语言安全问题，强调语言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及其战略意义，较少述及语言安全问题的个体层面和族群层面及其与国家层面的差异，个体和族群层面语言安全的专题研究成果十分乏见，亟待关注和重视；（2）较少以实地调查数据探讨边疆地区或少数民族族群的语言安全的专论；（3）多数研究停留在文献梳理的论辩上，缺少深入实地调查成果，包括中国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语言安全的调查成果；（4）网络、媒体等研究是近年来传播学研究的热点，但鲜有涉及网络媒体、大众媒体、科技产品语言安全的研究成果；（5）尚未发现有关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区语言安全问题及其战略意义的研究文献。

参考文献

- 艾萍, 2009a, 语言安全与民族文化安全[J]. 大连民族学院学报, (4): 345-347.
- 艾萍, 2009b, 语言安全与民族文化安全[D]. 中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车晓菲, 2012, 法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语言政策[J]. 法语学习, (1): 50-52.
- 陈兵, 2012, 东盟国家语言状况及广西的外语战略研究[J]. 外国语, (1): 77-82.
- 陈章太, 2009, 语言资源与语言问题[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 1-7.
- 陈章太, 2008, 论语言资源[J]. 语言文字应用, (1): 9-15.
- 达·巴特尔, 2011, 母语与语言安全问题——纪念第十二个国际母语日[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3): 161-164.
- 戴曼纯, 2011, 国家语言能力、语言规划与国家安全[J]. 语言文字应用, (4): 123-131.
- 戴庆厦、邓佑玲, 2001, 濒危语言研究中定性定位问题的初步思考[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 120-125.

- 戴庆厦, 2010, 语言关系与国家安全[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 1-6。
- 邓佑玲, 2004, 构建濒危语言指标体系的初步设想[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1): 62-66。
- 高莉琴, 2006, 关于延缓少数民族母语消亡因素的研究——濒危语言研究[J].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 (4): 30-33。
- 黄长, 2000, 各国语言手册[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 黄行, 2000,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研究[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康建刚, 2010, 中国外语规划与政策[J]. 中国电力教育, (19): 193-195。
- 孔庆东, 2008, 语言安全与汉语的魅力[J]. 绿叶, (7): 47-55。
- 蓝庆保, 2007, 具象与语言——由《暗示》引发的对语言安全问题的思考[J]. 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 101-104。
- 李梅峰, 2003, 论国家文化安全[D]. 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李宇明, 2011, 我国目前的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OB/OL]. 《读书报》记者熊彦清对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李宇明的采访,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3e237540100xyml.html, 2012-6-1。
- 刘迎胜, 2012-7-19, 我国最早的亚洲学院: 明四夷馆[OB/OL]. <http://history.m4.cn/1099371.shtml>。
- 鲁子问, 2007, 外语政策与国家安全——美国的经验与启示[J]. 外语教学与研究, (4): 123-127。
- 鲁子问, 2011, 外语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形态和对策建议[J].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6): 94-100。
- 罗冰眉, 2002, 试论信息全球化与国家安全[J]. 重庆图情通讯, (3): 13-19。
- 骆峰, 2010, 关注语言生活, 构建和谐社——首届中国语言生活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J].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6): 89-92。
- 阮文康, 罗文青译. 2006, 语言死亡: 语言的安全与不安全[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 22-24。
- 孙宏开, 2001, 关于濒危语言问题[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 1-7。
- 孙宏开, 2006,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排序研究[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 6-10。
- 王建勤, 2010, 美国“关键语言”战略与我国国家安全语言战略[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 7-11。

- 王建勤, 2011, 语言问题安全化与国家安全对策研究[J]。语言教学与研究, (6): 31-37。
- 王晓龙, 2012-7-19, 论明代四夷馆的特点及作用[OB/OL]。
<http://wenku.baidu.com/view/847c530852ea551810a6876d.html>。
- 王远新, 2002, 论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及其价值[J]。世界民族, (6): 1-10。
- 王远新, 2008, 加强人口较少民族语言的调查及弱势和濒危语言的保护[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 111-119。
- 伍慧萍, 2003, 德国的欧盟语言政策: 从边缘化到重视[J]。德国研究, (2): 31-37。
- 吴锡德, 2012-7-31, 法国的语言政策——全球化与多元化的挑战[OB/OL]。淡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承办“各国语言政策研讨会”宣读论文,
<http://mail.tku.edu.tw/cfshih/ln/paper06.htm>。
- 吴铮、闻静, 2006, 近二十年我国濒危语言研究述评[J]。长江学术, (3): 52-59。
- 徐世璇, 2002, 语言濒危原因探析——兼论语言转用的多种因素[J]。民族研究, (4): 56-64。
- 张学强、艾丽, 2011, 政治统治维持与蒙古文化扩张——元代百年蒙古新字教育运动考述[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5): 102-108。
-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编, 2006,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R]。北京: 商务印书馆。
-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编, 2006, 香港语言状况与语言政策[R]。北京: 商务印书馆。
-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编, 2006, 澳门语言状况与语言政策[R]。北京: 商务印书馆。
-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编, 2007,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R]。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周庆生, 2001, 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M]。北京: 语文出版社。
- 周庆生, 2003, 国家、民族与语言[M]。北京: 语文出版社。